

# 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及其当代价值

孙乐强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马克思绝没有忽视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性,而是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批判范式。这主要体现为3种模式:一是早期的异化批判模式;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三是后期的日常意识批判理论。后两种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文化批判是与经济批判和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脱离经济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批判,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西方左派经济学都没有真正地坚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精神,而是滑向了纯粹的文化批判和历史经验主义之中。

**关键词:**文化批判;异化;意识形态批判;日常意识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2)04-0006-04

在西方社会批判理论中,形成了两条独特的批判思路: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思路,一是西方左派经济学的经济批判思路。这两条线索无疑弥补了第二国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白,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也由此引发了3个问题:首先,如何理解文化批判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历史地位,换言之,马克思究竟有没有自己的文化批判理论?其次,马克思是如何理解文化批判与经济批判之间的内在关系的?最后,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基于此,笔者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详细分析,来全面阐述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的历史生成过程,并以此为基础,全面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和左派经济学的经济批判的理论贡献和内在缺陷,为新时期进一步推进对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 一、异化批判:马克思早期的文化批判逻辑

纵观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绝没有忽略文化批判理论的重要性,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批判范式。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3种:一是早期的异化批判模式;二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意识形态批判范式;三是后期的拜物教即日常意识批判理论。下面我们就来

详细分析马克思文化批判理论的生成与深化过程。

马克思一开始以一种唯心主义的姿态站在黑格尔的肩膀之上,向世界宣告了他的伦理激情,彰显了他对自由的渴望。然而,经过“物质利益”难题之后,马克思从睡梦中惊醒,意识到仅仅依靠理性和自我意识是无法与残酷专制的现实抗衡的,进而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之下,实现了人生思想的第一次变革,即由原来的哲学唯心主义转变为一般唯物主义,由原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哲学共产主义。而严格地讲,早期的异化批判模式恰是在这次转变之后确立的。在这方面,费尔巴哈的影响功不可没,他最先从宗教异化视角批判了黑格尔的学说,为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费尔巴哈的缺陷在于,他的批判仅仅停留在宗教异化领域,而没有进一步追问宗教异化产生的根源。相反,马克思则继续沿着费尔巴哈的思路不断地深入下去,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异化批判理论。这主要体现在“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劳动异化”的逻辑演进中<sup>[1]</sup>。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之所以发生异化,那是因为宗教的世俗基础本身产生了异化,致使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领域中分化出来,从而导致了人的政治异化,即“公人”和“私人”的二元对立。但是,马克思很快发现,这种政治异化之所以会产生,那是由于政

收稿日期:2012-08-28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11ZXC009)

作者简介:孙乐强(1982—),男,安徽萧县人,讲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治的基础即经济活动本身发生了异化。金钱原本是人创造的产物,但在经济生活中,它却直接成了市民社会的目的,成为一切事物普遍价值的衡量标准。结果,原本是人的创造物的金钱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主体,人不得不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这是一种全新的异化,是经济生活本身的异化。但是,马克思很快认识到,金钱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被看做为市民社会的上帝,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市民社会的基础是私有财产,而这种私有财产并不是历来就存在的,它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sup>[2]</sup>。所以,经济异化的根源并不在于交换过程本身,而是在于人的生命活动即劳动的异化,这样马克思就把经济异化推进到劳动异化的层面,由此创立了劳动异化理论。

可以说,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劳动异化的深化过程,是马克思不断摆脱他人影响,逐渐实现自己理论原创的过程,他直接把自己的批判逻辑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交换领域最后拓展到劳动生产过程之中,实现了理论研究对象的大转移,为后面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前提。但从总体来看,这里的异化批判模式完全是建立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之上的,它从一种理想的人性(“应该”)出发,借助于一根外在的尺度猛烈地批判这种颠倒的现实。这种抽象的伦理激愤带给人的的确是一种心灵的振奋,但它对现实而言却是软弱无力的,因为它不会对现实本身造成任何触动,既找不到革命的出路,也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因此,这种批判逻辑在本质上是隐性唯心主义的思辨逻辑,是一种典型的以人性为后盾的文化批判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异化批判理论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 二、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日常意识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生成与深化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真正生成的,并在后期著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格式塔的转变,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文化批判理论,即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从总体上看,这一批判主要体现为两个相互递进的过程:

一是将意识形态还原到社会生活过程之中,彻底瓦解了意识形态的自律神话。所谓“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指由思想家建构出来的“纯粹的理论”或由统治阶级以国家权力为后盾虚构出来的“虚假的观念体系”。这些思想家完全从意识出发,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把意识看做是历史发展的主宰

神,进而将原属于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放大为全人类的意识形态,彻底扭曲了历史发展的原动力。针对这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展开了彻底批判。在他看来,意识形态并不是历史的主宰神,而是社会生活的历史产物,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社会生活才是意识形态得以产生的社会根基,进而从根基上彻底瓦解了一切意识形态的自律神话。

二是诉诸“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一切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根基。马克思认识到,要想实现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仅仅停留在第一步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把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升到对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根基的批判,才能彻底消除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因此,马克思并不像意识形态家那样迷恋于观念革命,更没有借助于一种诗性之思来寻求心灵变革,而是诉诸“武器的批判”即革命实践来彻底瓦解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根基。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根基没有被彻底摧毁,那种对意识形态的任何“出离”和反叛,不论何等惊奇、何等壮观,其最终结果都必然重新回到形而上学的怀抱之中。只有彻底瓦解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才能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彻底颠覆。

从上述分析来看,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与早期的异化批判相比,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逻辑不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而是力图从社会历史的内在矛盾出发引出其在文化层面的历史效应,揭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产生的社会根源,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得以存在的社会根基,进而全面实现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彻底颠覆。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逻辑绝不是一种居于主导的自主逻辑,它是内含于社会物质生活过程之中的,因此,任何试图夸大文化逻辑的自主地位,力图通过以概念反抗概念的方法,来消除文化矛盾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第三,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是内在统一于一体的,它们最终都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在这里,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逻辑的确已经生成。但是,由于马克思自身理论水平的不足,致使其在文化批判理论上还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既然文化批判是建立在对社会内在矛盾的剖析之上的,因此,文化批判逻辑的深入与否就取决于对社会内在矛盾剖析的深入与否。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点显然还是有待提升的。此

时马克思还无法突破斯密的经济学视阈,仍从分工和交往关系入手来解剖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本质和运行机制,因而无法为他的文化批判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基础。其次,这一批判没有科学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既低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建构力量,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工人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观念拜物教束缚的实践机制。再次,这一批判没有科学解决意识形态与日常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本质和运行机制还缺乏科学分析,这就导致了他的文化批判理论还存在很大欠缺,即完全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批判维度上,而对资本主义日常意识还缺乏客观分析,更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这些恰恰是在后期的经济学著作中完成的。

在后期著作中,马克思从劳动力商品出发,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本质和运行机制的科学解剖,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文化批判理论。

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虽然文化批判的逻辑被还原到社会内在矛盾之中,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究竟是什么,显然此时马克思还无法清晰地揭示出来。到了后期,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经济矛盾。到了这时,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取得了更为科学的基础,即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批判来引出其在文化层面的逻辑效应,以此来实施文化批判。换言之,文化批判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和政治革命之上的,只有以经济批判和政治革命为基础,文化批判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

其次,在文化批判理论的核心上,实现了由意识形态批判到日常意识批判的转变。马克思以科学的方式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并深入分析了这种机制在观念层面上引发的内在效应。在这里,马克思着重区分了两个不同的层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日常意识形式。前者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统治者建构出来的“虚假的观念体系”;而与前者不同,日常意识形式并不是统治阶级从头脑中虚构出来的,而是个体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客观思维形式,是资本运作机制自身滋生的观念产物。不过,在马克思看来,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日常意识构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正是把生产当事人在资本的日常实践中形成的观念加以系统化、普遍化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统治、蛊惑工人的有力武器。因此,要实现

对资产阶级观念形态的彻底批判,就必须既要批判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又要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意识<sup>[3]</sup>。所以,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日常意识批判的转变,绝不是巴利巴尔所说的“取代”过程<sup>[4]</sup>,而是马克思文化批判逻辑的深化过程。

再次,形成了科学的拜物教批判理论,揭示了日常意识的核心。通过对资本主义外在现象的研究和考察,马克思形成了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批判理论。这一批判理论既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虚构,也不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而是资本主义内在本质和日常意识的科学凝练,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是具有客观效力的思维形式:无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还是资本拜物教,它们在本质上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颠倒”特征的真实写照。因此,要想真正消除资本主义的观念拜物教,就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这点必须要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

由此来看,第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批判存在两条相互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线索:一是意识形态批判,二是日常意识批判,而从意识形态批判向日常意识批判的转变,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批判逻辑深化的过程。第二,不论是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日常意识批判,必须要依托无产阶级革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日常意识得以存在的根基,因而才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日常意识。第三,文化批判是与经济批判和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脱离经济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批判,都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的。

### 三、马克思文化批判逻辑的当代思考

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被诠释为“经济决定论”,文化批判线索完全被淹没在实证的海洋中。作为对第二国际的反叛,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解读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路径,比如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批判、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等。它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然而,纵观这些批判路径,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共同点:第一,这些路径虽然在政治立场上都坚持批判资本主义,但在根基上并没有真正诉诸无产阶级革命,而是放弃了这种政治诉求,单纯地停留在文化批判的视阈中,这显然是不充分的。第二,虽然他们试图从经济层面展开分析,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处理好经济

批判与文化批判的内在关系,而是过分突出了后者的维度,忽视了对晚期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揭示。第三,在批判尺度上,放弃或修正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的批判线索,转向了以人本主义价值预设为核心的文化批判路径,过分放大了资本的文化霸权功能。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苛求,这种倾向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语境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路径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即西方左派经济学的经济批判线索,如斯威齐、巴兰、曼德尔、法国调节学派等。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们“没有遵循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所散布的观点而相信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已经挣脱了矛盾,而是坚持从生产过程或者说劳动过程的角度来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更没有过分扩大资本的文化霸权,而是始终从经济的层面来引出文化的社会效应。”<sup>[5]</sup>从这个意义上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相比,西方左派经济学更好地坚持和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路。然而,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抛弃了对资本主义本质矛盾的分析,而只是停留在单纯的经验层面上,陷入历史经验论的牢笼之中。比如,斯威齐和巴兰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只适应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转变,这一理论已经失去固有的效力。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即“经济剩余”,企图用经济剩余理论来取代剩余价值理论,用经济剩余的增长规律来代替一般利润率的下降规律。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一方面抹杀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阶级实质,掩盖了经济剩余的来源;另一方面,完全抛弃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和本质线索,走向了外在的分配决定论。因此,当他们从这种逻辑来引出文化批判和政治革命时,必然是有缺陷的,最终走向了“无产阶级消亡论”和虚幻的“世界革命”理论。再比如,法国调节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阿格里塔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已经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而是可以通过有效手段调节的经验矛盾。由此放弃了马克思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批判线索,走向了以历史经验为基础的调节理论,滑向了经验主义的窠臼之中。

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由此凸显出来,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将文化批判和经济批判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如何超越文化主导路径和历史经验论的?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内在本质的准确剖析之上的。

它通过对特定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形式的分析,来揭示这个社会特有的内在本质。后者既不是理论家自我虚构的产物,也不是简单地通过对经验材料或现象的归纳推演出来的,而是历史的内在矛盾运动自我彰显出来的结果,是本质的历史生成化运动。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经验论存在根本差异:后者单纯地停留在生活的表面现象上,错误地将历史表象当成本质属性,陷入经验归纳的窠臼之中;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不同,它通过对社会生活的科学抽象,剥离出现象背后的历史本质,然后,再将本质拉回到生活经验之中,一方面,科学诠释历史现象的生成过程,另一方面,全面阐发历史本质与历史现象的动态演变关系,从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的全面剖析。以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也是对一切历史经验论的超越与扬弃。

但仅仅停留在本质层面还是不够的,必须要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逐层揭示本质在现象层面的凸显方式,深层挖掘日常生活对社会本质的掩盖,揭示日常生活的狡猾性,以此来揭示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日常意识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可以说,不论是物化批判、日常生活批判还是意识形态批判,它们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因此,对它们的批判绝不能单纯地停留在外在现象或人性层面上,而必须将它们推进到社会本质层面,从历史发生学的思路出发,揭示这些现象得以产生的客观原因,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消除这些物化现象的科学道路,而不至于诉诸主客体的思辨统一或人本主义的总体化道路,后者是注定行不通的。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仍是我们从事社会批判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任何脱离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批判或经济批判,都必然会陷入文化主义或历史经验论的牢笼之中。

#### 参考文献:

- [1] 姚顺良.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和内在逻辑[J]. 理论探讨, 2007(6):38-41.
- [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73.
- [3] 孙乐强.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化[J]. 学习与探索, 2011(6):23-26.
- [4] 埃蒂安·巴利巴尔. 马克思的哲学[M]. 王吉会,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65.
- [5] 唐正东,孙乐强. 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2.